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已是一百一十多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一百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平等对话、自由竞争，形

叔本华一席话

德国人叔本华曾很感伤地描述：“据希罗多德说，薛西斯（波斯国王）检阅自己的百万雄师时，想到百年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坯的死运，感慨之余，不禁恸然泣泣。我们再联想起书局、出版社那么厚的图书目录中，如果也预想到十年以后，这许多书籍将没有一本还为人所阅读时，岂不也要令人兴起恸然泣泣的感觉？”

叔本华这一席话，认为作品在十年以后，便无人问津，听来有点煞风景，也太戳作家的肺管子。看到那些大概连书店都没进，直接从印刷厂就进书库，然后再送到造纸厂的书，就想起叔本华这番挺悲观的话语。他为图书馆书架上的书籍无人问津而“恸然泣泣”，其实，这种文学读物的命运，等于未足月的早殇儿就一化了之，那才令人心丧意沮。我问出版社老总，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他苦笑，一脸难言之隐。

当然，印刷出来，卖不出去，未必就是没有价值的书，同样，卖了出去，而且轰动，未必就是有价值的书。回想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在那红红火火的文学旺季里，一些作家，曾经像焰火那样闪亮，一些作品，曾经像二踢脚那样，忽然间闹出过很大动静，都是过来人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事情。那些年里活跃在文坛，一枝独秀，甚至饮誉海内外的作家，以及他(她)引领潮流的作品，有谁能毫不费力地数出十部作品中主人公，是男是女？姓甚名谁？

显然，这种轰动和热闹，很大程度上像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在太阳底下，无论怎样地五光十色，亮丽绚丽，总是会烟飞灰灭。才二十年啊！因此，不能不承认，时光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官，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得到受它的最后判决。谁也逃不脱时间老人手中那面筛子，凡经不起筛选的作家和作品，早早晚晚都要被淘汰，从筛眼里跌落下去。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有诗：“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文学的不朽，在于其文学内在的生命力，文学以外的因素，可能起一时的作用，却不会起永远的作用。

所以，文学应该尽量拒绝炒作，同样的道理，各行各业，也应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放在首位才是。

摘自《中华读书报》10月13日 李国文 文

高稿酬是纯文学期刊的灵丹妙药吗

不得不承认，在纯文学期刊宣布提高稿酬之前，稿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纯文学期刊在国内刊林中的地位，但稿酬绝不是纯文学期刊销售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网络几乎占据“80后”、“90后”、“00后”的整个业余时间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纯文学被推到了冷板凳。现在的年轻人看的是用他们的语言描写他们生活的作品，这才是他们强调的“时代气息”。年轻人愿意拿出几元钱买一本薄薄的文摘类杂志，也愿意买定价在20元左右的时尚杂志，却将定价10元至20元的纯文学期刊冷落一边时，纯文学杂志应思考的远比稿酬还要更多。

纯文学期刊有着繁琐的用稿程序，一篇稿件从投稿到被安排发表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是常有的事。在网络化时代很多纯文学期刊甚至拒绝接受电子稿件，只热衷于纸质稿件。稿件处理周期的冗长加之名家优先、熟人优先、本地优先等种种关卡，让对纯文学跃跃欲试的人们失去了兴趣。而纯文学期刊看不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的审稿周期短，大门敞开得也相对大一些，包容性多一些，所以更容易占据平民化市场。如果提高的稿酬只发给那些名家的不出名作品和几位熟人，稿酬提高就没有太实际的意义。若是扶持新人，让持有不同文学观点的人融入到被认可的“作家”行列，那纯文学刊物的稿源就多了，相信其中也会有一些不错的稿子。

纯文学刊物提高稿酬的来源主要是靠政府投资，而非自己的盈利。当文学变成政府行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担心：这样的高稿酬能持续多长时间？遍布在全国各省市的纯文学刊物，是否能够效仿上海和北京的做法？

纯文学刊物以“厚重”、“深刻”自居，却忘了他们早已经变得“厚”而不“重”。纯文学变小众时，其主要载体纯文学期刊更应该给自己找一个适合的出路，除了稿酬，更应该切实看重作品本身的质量，更应该包容文学多元化的存在。

摘自《北京青年报》10月20日 照日格图 文



宗江寻梅图
丁聪 作

被异化的高考作文

每年高考语文课目一结束，作文题便在网络被公布，揭秘快感，让许多人乐此不疲。为什么高考作文那么吸引人呢？

作文是人文素质的综合体现，这是一般大众的评价和认知。在人们看来，一名学生作文写得好的，作文中包含的思想、见识，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力以及将这些转换成文字，合理地结构到文章里的能力才是关键。这些文字以外的东西展示出的学生内在的文化修养，才是衡量作文好坏的标准。对于高考的作文题，人们似乎更愿意把它看做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试图从中透视或体察起伏回轮的当下社会思潮，进一步求解重塑学校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可是，当下中国的语文教学中，作文的基本顺序被整个颠倒，作文应试技巧被放在了首位，其他反映思想、见识等的“内容”部分已经异化为由应试技巧所构建的宏大框架中的填充物。而且，作文“内容”的获得已经不再与考生的人生经历以及生活体验直接相关，学生只需要阅读相应的材料，从有限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别人间接生活经验中汲取能够直接派上用场的“营养”，

北大中文系的传统

成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持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在比较、对峙、驳难、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欠缺的不是好观众而是好作品

国庆期间，德国科隆歌剧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与以往对经典作品照本宣科式的演绎不同，该版《唐·璜》将故事搬到当代，在表演方式、舞美、服装等方面都大胆创新，并且加入Iphone和GPS等颇具当代气息的元素，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观看。

流行文化演出相比，国内的高雅艺术演出市场一直以来似乎要逊色许多。这让很多高雅艺术演出从业人员对中国演出市场的环境和观众素质颇有微词。而新版《唐·璜》却用事实证明了中国高雅艺术演出市场的潜力。

在此之前，科隆歌剧院还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瓦格纳经典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版歌剧将具有传奇色彩的北欧神话故事置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全新的舞台演绎，赋予了这部音乐诗鲜活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要完整地看完作品需要连续四晚坐在剧场内观看16个小时，这对每个观众来说都是体力和毅力的艰巨考验。歌剧演出的8个晚上，上海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每场演出结束后，潮水般的掌声都仿佛要将剧场淹没。

通过这两场演出我们看到，中国的高雅艺术演出市场并不缺乏热情专业的观众，值得反思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在艺术创作方面，我们应当如何让高雅艺术的经典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特点，而不是成为博物馆里的活标本？艺术从业者应当少一些对观众和市场的抱怨，多一些对艺术的苛求与执著。

摘自《人民日报》10月15日 刘阳 文

从年度文化符号看中国表情读出自信奋进与率真

2010年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什么？中国网民在目前的网络调查中给出了答案——上海世博、国产电影与80后。

用一次网调结果注释中国文化难免以偏概全，但透过三个简简单单的关键词，人们还是不难读出当代中国自信、奋进与率真的生动表情。

时光如果倒退30年，蛤蟆镜、喇叭裤曾轻轻松松地击溃中国人的审美防线，纷至沓来的西方学说与思潮更曾使一代学子陷入迷茫，“崇美哈日”甚至一度成为最时髦的标签……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昨日黄花。在走进书店便可寻觅到全球最新的学术论著、轻轻点击键盘便可览尽全球风云的今天，中国红再次成为国人最追捧的亮色，国学热红遍大江南北——上海世博折射出中国融入世界进程中不断积累的自信与从容。开放的中国以其特有的宽广胸襟欢迎世界文明。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的话“上海世博是一个分享人类智慧的平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共识。

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日前发布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产业黄金五年发展战略报告》为中国电影业描绘出一个异常绚丽的前景。

如果是十年前，这样的大胆预言恐还难逃“痴人说梦”的猜忌，但今天已没有人会怀疑中国电影产业所拥有的这种巨大潜能。若将电影产业的飞跃发展视为中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缩影，那么文化产业在全球经济不振背景下的逆势而上则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写下下一个华丽的注脚。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民众的精神诉求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与多元，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艺术创作热情的高涨。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因“小皇上”的标签而备受争议的80后开始步入“而立之年”，逐渐成为社会中坚。这些看着日本动画、吃着美国快餐、穿着韩国潮服长大的年轻人根本无从理解“八亿人民八部戏”的文化困窘。他们用搜索引擎取代长辈权威，通过微博直抒胸臆，既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隐瞒自己的是非判断。他们开始变得不再年轻的脸庞则日益成为中国形象的代名词。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也曾根据网民的投票评出中国20大文化符号。其中，汉语、北京故宫和长城分列前三甲，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等紧随其后。中美两份榜单也许可以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思考——当旁观者将视线停留在昨天的同时，是否已遗漏了中国当下最鲜活的表情？

摘自中国新闻网10月21日 朱丽华 文

将此“营养”连缀成文，去应付高考，乃至获取高分。这样，作文与人生以及社会生活之间天然存在的联系彻底终止了。

用与自己无关的伪博学、假崇高这种大而化之的话语和素材，或者用“假大空”去填充作文，实质上就是依照不合理的手段博取人生的转折和命运的改变。这本身就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也会给学生一种反面的提示。因为他们的“成功经验”中留存的不合理、不诚实方式获利的因子会随时因人生的弱点而一次又一次地发芽。

作文与人生、人的生活体验、经验的隔绝，意味着作文与语文所含有的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脱离。它不仅使中学生对于生活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而且影响到他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接受和理解。因为人文社科理论如果与人身自身的经验无关的话，对个体来说就永远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是这样做下去作文不再具有检验考生人文综合素质功能。人们原来对于作文的诸多关乎人生的期待也随之淡化、最终被抛弃。高考作文异变成了又一种专门考核知识的纯粹职业性、技术性的考试。考试的目标是分数，“知识改变命运”被简化成了“分数决定命运”。

摘自《读书》第10期 尤小立 文

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

做学问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是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在纪念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理应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入的精神。

摘自《新京报》10月19日 谢冕 文



我们喜欢上了文学，往往不是因为文学如何伟大，有什么特殊功效，如何可以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文学并不是灵丹妙药，不是什么大力丸，服了它，国家就能够很快改变模样，文化层次立刻可以有很高提升。用文学“有用”或者“伟大”来诱惑的最大弊端，说白了就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它不过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现代翻版，是把庸俗变为高雅，是把低俗转为高尚。人们并不会因为足球伟大全去踢足球，因为音乐伟大全去弹钢琴拉小提琴，因为当官更容易为人民服务全去当公务员，因为银幕上或舞台上的角色是英雄全去当演员。是人都应该有一份平凡之心，要干一行爱一行。是人都应该有一份敬畏之心，要干一行尊重一行。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没有理由坐井观天，妄自菲薄不对，盲目自大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向智利学习矿难救援

今年，在刚遭受大地震的几个月后，一场矿难让全世界在长达69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着智利。在最后一位矿工升井之后，令仁爱、团结、智慧、秩序的国家形象已经赫然树立在全世界公众的心中。

令我们略微错愕的是，这个故事没有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如果是那样，可能并不能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智利的矿难营救，显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固有印象的拉美。尤其是联想起几个月前中国山西同样发生的王家岭煤矿矿难救助过程，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矿难的安全制度和救援机制与技术上，我们落后于智利。

“未来属于拥有悠久记忆的国家，更属于未雨绸缪的国家。”法国文化部部长密特朗这样说。9月22日，法国文化部宣布，法国“文化、科学和教育内容数字化”工程将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总预算为7.5亿欧元，其中75%用于项目投资，25%用于资助部分科研项目。

这个由法国文化部牵头进行的文化工程是法国政府提出的“投资未来”计划的组成部分。去年12月14日，法国总统萨科奇曾宣布，法国将在未来5年内动用350亿欧元投资于对国家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5个领域，即高等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工业与中小企业、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并特设45亿欧元的“数字社会国家基金”用于推动数字化应用计划。

法国文化部十分强调数字化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意义。实际上，除了法国文化部制定的文化遗产数字化计划，国家视听机构、法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协会、音乐研究协调机构都有了各自的数字化计划。法国文化部还重申：此次计划重在投资，合政府与企业之力，将数字理念和技术应用于实践与生产，并以此推动文化产业、艺术创作和媒体的发展，为法国拓展新的文化空间。法国“文化数字化”工程的立项将分多次进行。在面向图书出版、音乐、电影、音像、摄影、图片、电子游戏等文化产业领域的各类企业、协会、公立和私营机构以及个人广泛征集项目后，由专门评审委员会遴选确定项目，给予不同程度的投资和补助。

密特朗曾表示，“文化数字化”工程直接关系到其一贯倡导的“文化到人”理念，并称法国在国内投入7.5亿欧元的同时，还将在欧盟范围内继续推进欧洲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积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法国此次正式启动“文化数字化”工程，还与整个欧洲的数字化进程这个背景分不开。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欧洲2020战略》把“欧洲数字化议程”确立为欧盟促进经济增长的旗舰计划之一，发布了3项任务即智慧型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该战略指出，智慧型增长意味着要强化知识创造和创新，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摘自《中国文化报》9月30日 朱晓云 文

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对于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一点用都没有，文学也一点都不好玩。文学只对那

些准备要感动的人起作用。我们所以感动，是因为已做好被感动的准备，是文学搔到了我们的痒处。否则仅仅是把文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竖一个再大的牌坊，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文学作品如果不被阅读，无论什么名著，无论什么大奖，都和垃圾没太大区别。因此，一个人准备从事文学工作，别老想着当鲁迅、当托尔斯泰，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要知道，文学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光想着拯救别人，而是先要拯救自己，打算去惊醒愚昧的国民前，最好先让自己清醒醒。

摘自《江南》第5期 叶兆言 文

范用先生与三联书店

范用先生是一位职业出版家、一个纯粹的爱书人。他是真正热爱出版而投身出版这一行的。书，对于他而言，就是生活，就是生命。所以，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领域的传记时，范先生就建议书名为《为书籍的一生》，这是他自己心灵的写照。他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他的话，如此直白，如此深情，如此真诚！

范先生是一个特别要“好”的人，对所珍爱的书，他更是讲究用纸，讲究装帧设计，讲究书的书卷气，讲究朴素高雅，讲究手感和亲切感。从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起，他就开始设计图书，直到晚年，成为真正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时代装帧设计风格的书籍装帧大师，影响了三联书店几十年来的设计风格，也影响了中国书籍装帧界。由于对书的挚爱，他还策划了《西谛书话》《晦庵书话》等一批书话，编辑了《爱看书的广告》《买书琐记》《叶雨书衣自选集》等有关的书。

范用先生又是一位一生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家。在这一点上，更多可以看出他是在邹韬奋先生等老一代三联创办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为抗日救亡和传播进步文化而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1979年与陈翰伯、陈原等创办《读书》杂志，发表《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傅雷家书》《牛棚日记》《随想录》全本、《为人道主义辩护》等的出版，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文革”后解放思想和文化启蒙起到巨大作用。范先生在80年代初还策划了《聂绀弩杂文集》《胡风杂文集》《高尔基政论杂文集》《我热爱中国》《凋谢的花朵》等一批思想性、开放性很强的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也是经范先生介绍到香港的杂志发表，后来又力争在国内出版。在该书审稿意见的最后，他写道：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做“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突出显示了一位资深出版家的深谋远虑。如今，同类型的书已成为三联书店的传统和品牌。

范用先生是惟一一位从1938年起直至离休都没有离开三联出版第一线的出版界前辈。是他，全面继承了老三联的珍贵传统，又从各个方面开创了新三联的独特风格和境界。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今天的三联人可能直接汲取到邹韬奋先生的骨气和文气；通过他瘦弱而极富生命力的形象，我们也不断感受到那一代叱咤风云的出版人物的神采。如今，范先生去了。我们只能通过反复的追思，在我们心中留驻他高贵的精神，直到永远。

摘自《光明日报》10月20日 汪家明 文

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对于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一点用都没有，文学也一点都不好玩。文学只对那

些准备要感动的人起作用。我们所以感动，是因为已做好被感动的准备，是文学搔到了我们的痒处。否则仅仅是把文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竖一个再大的牌坊，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文学作品如果不被阅读，无论什么名著，无论什么大奖，都和垃圾没太大区别。因此，一个人准备从事文学工作，别老想着当鲁迅、当托尔斯泰，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要知道，文学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光想着拯救别人，而是先要拯救自己，打算去惊醒愚昧的国民前，最好先让自己清醒醒。

摘自《江南》第5期 叶兆言 文

工明确的专业救援团队，其中包括救援人员、医护人员和一个专门实验室，负责设计救援所需器械和设备，同时还邀请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小组提供意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矿工最后的出井顺序完全是按照预先设定的名单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当然，在这场国际大援救中，各种钻探、救援技术的应用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但令人更惊叹的，是这个只有1500万人口的国家的基础制度和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在矿难中体现出来的能力。现在全世界可以看到智利33位获救矿工的详细资料，比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矿难，我们更熟悉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矿工的名字。这种不同是造成我们感慨的原因，也是结果。

摘自《环球时报》10月15日 刘文 文

从肖传国事件看学术界风气

学术圈习惯以“大环境腐败”的假设开脱自己，这本身就是学术腐败的证明。即便全社会都腐败了，学术圈也没有腐败的理由，因为诚实是学术的前提，是学术成为职业的前提。

在肖传国看来，导致他院士落选的不是其学术造假本身，而是方舟子对学术造假的揭露。换言之，如果没有方舟子这个体制外的人物在那里大抡板斧，他的学术造假或许根本不可能被体制所发现。学术潜规则的运行，已成功地形成了一整套清除学术“告密”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本来是自己在造假，却迁怒于他人的告发，肖传国已完全丧失了道德自省的能力。这里不想只停留在对个人道德进行裁决的层次，道德的讨论固然重要，但不应把背后的问题掩盖起来。事实上，道德自省力的丧失，乃是学术圈的流行病，它暴露了宰制学术生产的一种结构性关系，即学术生产越来越取决于学术环境的外部性，而不是学术本身。

以人文学界而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除了真正为学术研究写作的少数学人之外，不少人都将麻将桌上过日子。促使他们走到麻将前的是这样一种机制：与学术刊物或各种基金委有关系的，不必努力，论文也会照发，基金也会照拿；没有关系的人，你做得再多，在既不能发表又无助于申请基金的名义上也是白搭。

在这样的学界共识下，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基金，或评不上院士，他自然不会从自身的方向上找原因。他只能断定：要么关系还不够硬，要么有人从中作梗。当肖传国得知是方舟子在那里“作梗”，焉有不清除的道理？“清除行为”体现的是学术潜规则赖以运转的自我修复能力。遗憾的是，这次“清除行为”的对象是学术圈之外的人，类似禁发论文、禁评基金的学术惩罚方式对他并不适用，所以才不得不动用了黑社会的资源。

学术界与黑社会，这种勾结是事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它们的关系是偶然的，还是互为隐喻的？这恐怕是肖传国事件留给我们的回避不了思考。

摘自《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 毕会成 文